

■关注

美术作品中的劳动者形象——

“劳动最光荣”的精神底色始终未变

□邵晓峰

劳动是岁月的脊梁,是文明的底色。它蕴含最朴素的光荣,承载最崇高的信仰,孕育最伟大的力量,绽放最动人的美丽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中国社会历经制度变革、产业升级、城乡转型、科技革命与民族复兴的伟大跨越,农业、工业、城市基建等传统劳动形态迭代升级,科技创新、乡村振兴、数字服务等新型劳动形态蓬勃兴起,劳动者的阶层结构、职业身份、精神风貌与生存状态发生深刻变革。

美术作品作为时代的视觉镜像,其塑造的劳动者形象同步呈现鲜明的时代性之变: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昂扬的工农群像,到新时期人文自觉下的平凡个体肖像,再到新时代大国工匠、科技工作者等多元群像,造型风格、叙事逻辑、审美取向与人文视角持续革新。与此同时,以劳动者为表现对象的美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,秉持劳动光荣、实干兴邦的价值内核,坚守现实主义艺术道路与家国情怀、民族风骨,劳动者形象塑造的精神底色始终未变。“变”与“不变”辩证共生,共同构筑起新中国劳动者美术形象的图像谱系。

劳动者形象的“变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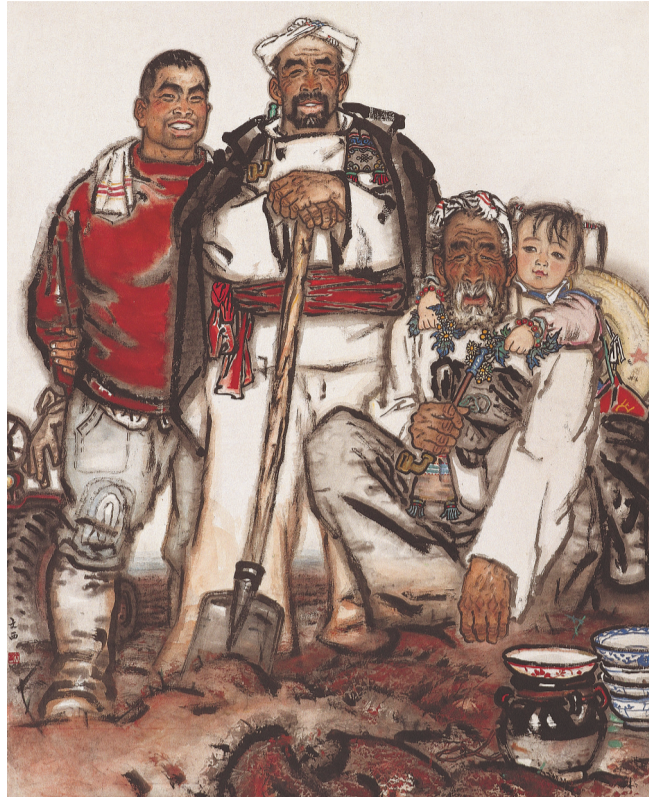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,美术创作全面践行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精神,确立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”根本方向,艺术家深入工厂、农村、矿山、边疆,以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,塑造翻身解放、朝气蓬勃、充满建设激情的劳动者典型群像。此类美术创作题材聚焦传统农耕农民、钢铁产业工人、基建勘探队伍、妇女劳动者,以宏大集体叙事为主,强化时代共性,人物造型健美挺拔、色彩明快饱满、构图昂扬壮阔,凸显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昂扬斗志。刘文西《子孙四代》(1962年,中国画)、方增先《粒粒皆辛苦》(1955年,中国画)、王文彬《劳模》(1962年,油画)等经典作品,将劳动者形象高度典型化、精神理想化,成为该时期的鲜明标识。

1966年到1978年这段时期,劳动题材美术高度依附革命叙事,劳动者形象与革命战士形象深度融合,人物造型呈现出现代化、程式化特征。工农形象多为身材高大健硕、神情坚毅刚毅、姿态昂扬奋进的统一范式,作品的艺术个性相对弱化,风格高度统一。

从1978年至2012年的改革开放新时期,美术创作实现重大审美转型,大量作品转向对个体生命的表达,创作风格从理想美化转向现实写实,从政治叙事转向人文关怀,劳动者形象的个体性与人性温度成为创作表现的核心。这一时期的作品聚焦普通人的命运与生活百态,彰显人文自觉下的新的时代特质。譬如,罗中立《父亲》(1980年,油画)、广廷钰《钢水·汗水》(1981年,油画)、何多苓《春风已经苏醒》(1982年,油画)、詹建俊《潮》(1984年,油画)、王玉珏《卖花姑娘》(1984年,中国画)等经典之作,开启了聚焦劳动者个体的人文审美新时期,标志着中国美术从集体宏大叙事走向对普通人的生命关怀,叙事更为开放和深刻。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,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。随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,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型,现代农业提质增效,高端制造、航空航天、数字科技等新兴领域快速发展,劳动者群体从体力型向知识型、技能型、创新型、智慧型转变,劳模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,成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新时代美术紧扣民族复兴主题,全面聚焦包括新型劳动者群体在内的全体劳动者,在题材广度、形象厚度、精神高度与艺术深度上实现全方位突破,劳动者形象塑造完成历史性变革。与此同时,新文艺群体作为新生创作力量,以独特视角、多样媒介与灵活的创作姿态,扎根基层劳动现场,丰富了劳动者形象的塑造维度,拓展了劳动美术的生态格局。譬如,表现新型劳动者群体方面,聚焦国产大飞机研发团队协同协作的范春晓《中国制造走向世界——C919大飞机》(2019年,



子孙四代(中国画) 刘文西作 中国美术馆藏

中国画),聚焦太湖生态治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商亚东《最美大湖水》(2021年,油画),聚焦屠呦呦科研团队的马蕾、张彩翼《呦呦鹿鸣》(2019年,坦培拉),聚焦乡村农民直播带货、线上销售农产品的郭健濂、褚朱炯《互联网的春天——农村电商》(2019年,油画),聚焦武汉长江大桥基建工人齐心协力的曹丹铜《阳光下的大桥浇筑工》(2019年,版画),聚焦企业家在摩天大厦中的办公室商讨“云服务”的王鹏《云端时代》(2024年,中国画),以及新文艺群体美术创作中,聚焦渔民与大海融为一体、互为构成的郑红飞《渔之歌》(2019年,农民画),聚焦湘西锻工劳作场景的戴岩贵《铁火炼心》(2024年,油画)等优秀作品,其中的新时代劳动者形象,承载了执着专注、精益求精、一丝不苟、追求卓越的劳动精神。这些美术作品中的劳动者形象,既是鲜活职业个体,更是民族复兴的奋斗者,体现了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有机统一。

劳动者形象的“不变”

历经70余载时代的巨变与审美更迭,新中国美术中劳动者形象的外在形态不断革新,但五个核心本质始终未变,构成劳动题材美术一脉相承的精神根基,彰显出跨越时代的精神张力。

其一,人民主体性永恒不变,劳动者始终是艺术表达的第一主角。新中国美术始终坚守人民立场,劳动者始终占据艺术创作的中心地位,工农大众、普通建设者始终是视觉表达的核心。从工农群像到多元劳动者,文艺创作始终扎根人民,为人民抒写、为人民造像,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追求贯穿始终。这一特质在新文艺群体的创作中同样鲜明,其聚焦的基层劳动者、小众行业从业者,进一步拓展了劳动者形象的表现领域,让艺术表达更具全面性。

其二,劳动崇高的价值信仰不变,“劳动最光荣”始终是创作的核心导向。70余年来,劳动题材美术创作始终歌颂劳动的伟大,崇尚劳动美德、赞美劳动创造,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集体劳动、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平凡奋斗劳动,还是新时代的创新工匠劳动,均坚守“劳动创造幸福、实干成就伟业”的核心价值,彰显勤劳质朴的精神追求,使“劳动最光荣”成为



云端时代(中国画) 王鹏作



最美大湖水(油画) 商亚东作 中国美术馆藏

贯穿始终的审美共识与社会共识。

其三,扎根生活的艺术道路不变,“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”始终是创作准则。劳动题材美术从未脱离现实生活,所有经典作品均源于艺术家深入劳动一线的采风、写生与生活体验,拒绝空想虚构与脱离现实的表达。从刘文西扎根陕北、罗中立深入大巴山,到新时代画家走访实验室、工地、车间与乡村田间,再到新文艺群体深入基层劳动现场,艺术家始终坚守现实主义本源,记录时代劳动原貌,这是劳动者形象生动、艺术作品深刻感人的根本动力。

其四,家国担当与民族风骨不变,劳动者形象始终与国家命运、民族发展同频共振。所有劳动者形象的塑造均与国家发展紧密交织,将个体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,家国情怀、赤子初心与民族精神始终是人物塑造的灵魂,使不同时期的劳动者形象均承载着鲜明的民族特质与时代担当。

其五,坚韧质朴、勤劳奉献的民族品格不变,华夏民族五千年传承的劳动美德,在新中国美术的劳动者形象中延续。无论劳动者的职业身份、技术专长如何随时代变化,其身上蕴含的勤劳踏实、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、团结互助的民族底色始终未变,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标识。

劳动者形象塑造的时代意蕴

新中国美术中劳动者形象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,并非对立割裂,而是辩证统一、相辅相成的关系,共同构成美术作品中劳

动者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精神内涵。

“变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。社会生产力的升级、劳动形态的迭代、城乡结构的转型、科技文明的进步与审美思想的解放,必然推动劳动者的身份、样貌、劳动场景与艺术表达持续更新。新时代以来,劳动形态从体力劳动向智慧劳动转型,从传统行业向新兴业态延伸,劳动者形象的与时俱进,使美术创作始终紧跟民族复兴步伐,成为时代发展的生动记录。新文艺群体的崛起与创作实践,也是“变”的体现,其拓展了劳动者形象的题材边界、表达形式与观察视角,为以劳动者为表现对象的美术创作注入了新的时代活力。

“不变”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。人民立场、劳动信仰、家国精神、现实主义传统与民族品格,是新中国美术的立身之本,跨越70余年岁月依然永葆生命力,使不同时期的劳动者形象拥有共同的精神灵魂,形成连贯统一的新中国劳动视觉史诗。这种“不变”,确保了美术创作始终坚守文艺初心,传承民族精神,凝聚起推动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。

此外,劳动者形象塑造的“变”,到内在精神一脉相承、筑牢文化根基的“不变”,二者辩证共生,使新中国美术中的劳动者形象既真实记录了时代变迁,又深刻传承了民族精神,成为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程的视觉档案,推动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劳动主题美术创作格局。这些优秀的美术创作,让精神穿越时光,在丹青中永恒,在岁月中熠熠生辉。

(作者系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、教授)

活化了一部“人民视角”的抗战史

□王晓戈

由鹭江出版社策划的《寒夜破晓:福建木刻版画中的抗日战争》(以下简称《寒夜破晓》)以抗战时期福建临时省会永安为核心,兼及建瓯、松溪、闽南、闽西等重点区域,搜集了野夫、胡一川、宋秉恒、萨一佛、朱鸣冈、荒烟、耳氏、许霖、吴忠翰、林椿、林樾等一批重要木刻版画家的作品,于1931年至1945年间在福建创作发表的近600幅木刻版画作品,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抗战时期福建木刻版画创作的全景,为福建抗战美术研究提供了更完整的观察视角,填补了该领域因资料缺失形成的学术空白,是近年福建地区抗战美术史研究的一次突破。

木刻版画创作是抗战时期福建永安文艺抗战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烽火连天、物资匮乏的岁月里,木刻版画以工具简便、制作快捷、易于复制、宣传直接的特点,成为唤醒民众、凝聚抗战力量的重要武器。在永安进步文化运动引领下,福建涌现出一批优秀木刻版画作者,他们以炽烈的爱国情怀,创作出很多震撼人心、鼓舞斗志的作品,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长期以来,学界对中国抗战美术的研究多聚焦于延安木刻及重庆、桂林等文化中心,对作为东南抗战文化灯塔的福建木刻运动,还缺乏更为系统的梳理与呈现,虽有零散资料与研究成果,但整体性与全面性还有所欠缺。诸多珍贵作品及史料或散落民间,或遭岁月侵蚀,致使福建抗战美术全貌难以完整呈现。

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在鹭江出版社雷戎社社长的



救石妇(1940年,木刻版画) 野夫作

策划与推动下,编撰团队以永安收藏家安孝义先生、安文璐女士珍藏的抗战文献为基础,结合国家图书馆、浙江美术馆、广州美术学院胡一川研究所、中央苏区(闽西)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,以及朱鸣冈、胡一川、周瑛家属提供的作品图片,经过对中国抗战史、福建抗战史及福建抗战美术史料的梳理考证,最终编成此书。书中收录的许

多珍稀木刻原作、手稿、出版物及口述史料为首次“面世”,以生动可感的图像语言,清晰勾勒出福建抗战木刻创作的整体谱系与演进轨迹,活化了一部“人民视角”的抗战史。

该书收录作者阵容强大、作品极具代表性,为近年木刻研究领域所少见。这些作品并非简单罗列,而是基于严谨学术考据,清晰梳理了福

建木刻运动从发轫、发展到强盛的历史脉络。书中收录的大量散佚于旧报刊、档案及私人收藏的原作,以高清图大呈现,如胡一川风格鲜明、极具视觉张力的《吹动抗战的军号,前进!》《仇恨的子弹》,宋秉恒充满力量与感染力的《起来!起来!不愿做奴隶的人们!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!》《燃起了自救的烽火》,荒烟构图精严、刻线缜密的《五四的咆哮》《神圣的任务》等。这种系统性的整理,既是对艺术家个体成就的再确认,更是对一个时代艺术思潮与创作实践的立体还原。

福建抗战木刻版画体现出战斗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融合,它们首先是“斗争的武器”,其次才是“艺术的作品”。书中每一幅作品,都是那个烽火年代的缩影。艺术家们以刀代笔、直面现实,生动深刻地记录了从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到后方民众支援保障,从日寇暴行到人民苦难,从生产建设到文化宣传的全景。《母亲》(萨一佛作)饱含深情,《百工图》(朱鸣冈作)充满生活气息,《饥饿战线上》(浦江怒潮)(胡一川作)以强烈黑白对比、粗犷有力的线条和画面中涌动的强烈的悲愤与愤怒,点燃民众保家卫国的信念;《游击队》(胡一川作)、《虽余一兵一卒亦必战斗到底》《袭击归来》(宋秉恒作)等,展现前线将士英勇杀敌、后方民兵坚持游击的场景,木刻家以刚劲刀法塑造出顶天立地的战士形象,歌颂民族英雄的崇高精神,极大鼓舞了抗战士气。《垦荒者》(宋秉恒作)、《寒夜破晓》(厄州作)、《增产声中》(朱鸣冈作)、《神圣的任务》(荒烟作)等,生动呈现了修筑工事、抢救伤员、垦荒生产、支援前线的感人画

面,共同构成一部镌刻于木板的福建“抗战实录”,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与图像证史功能。民族危难之际,一代木刻家将个人艺术生命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,他们既是艺术家,更是战士,刻刀既是创作利器,亦是掷向敌人的投枪。

福建抗战版画是中国美术民族化与时代性探索的重要成果。福建木刻家在吸收欧洲版画,尤其是苏联现实主义与德国珂勒惠支表现主义风格的同时,积极探索木刻艺术的“中国气派”与“民族风格”,从汉代画像石、民间剪纸、年画等传统艺术中汲取养分,形成了粗犷雄健与细腻抒情兼具的多元风格。该书的作品遴选,充分彰显了这一艺术追求。通过这些作品,可见中国木刻家在国难当头之际,如何将外来艺术形式转化为民众喜闻乐见、能有效承担社会动员使命的视觉语言,这本身便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次伟大的艺术实践。

此外,福建抗战木刻一方面传承了鲁迅倡导的“新兴版画运动”的革命性与先锋性,坚守艺术为人民、为革命服务的初心,立足民众立场,贴合抗战需求;另一方面,这些作品的内容兼具纪实性与叙事性,真实记录了时代风貌与人民抗争精神,艺术风格上的大众化、民族性特征,彰显了创作者的文化担当与艺术自信。福建木刻的蓬勃发展,使福建美术创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,走在了中国版画乃至整个美术创作领域的前沿,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艺术宝藏与精神财富。

(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系副教授)